

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打破常规思维定式，巧妙运用逆向思维指导我军作战，谱写了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深刻总结毛泽东作战指导中的逆向思维艺术，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指挥员的战略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逆作战原则之向，打破循规守常禁锢

在指导我军作战时，毛泽东一向坚持灵活用兵，他认为，作战原则是带规律性的东西，固然要遵守，但由于战场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战略指导者不能机械、盲目地遵守作战原则，必须打破守常思维禁锢，着眼战场情况发展变化，从作战时间、地域等情况出发，把握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实施正确的作战原则。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发起的很多战役或战斗都生动体现了毛泽东逆作战原则之向的高超艺术。如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指导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敌实施战略进攻。乍一看好像违背了常规的战略进攻原则，因为常规战略进攻原则在时机上一般选择在对方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之时，在方向上大都选择在对方重兵集结之地，在样式上通常采取沿正面进攻，逐城逐地向前平推，但恰恰相反的是，毛泽东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我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就实行不要后方的跃进式战略进攻，这一作战指导上的逆向思维决策，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拉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大大缩短解放战争进程。再如，毛泽东将“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

毛泽东作战指导中的逆向思维艺术

□ 夏洪波 卜国峰

队”作为“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内容。按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计划利用三个月至半年时间休整部队，但为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的方针，毛泽东“违背”利用两个战役间隙休整部队的原则，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入关。当平津战役打响之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并先敌完成“隔而不围”战略部署，为隔断敌人从天津塘沽南撤退路夺取了有利战机。

逆历史经验之向，摆脱惯性思维羁绊

指挥员对历史作战经验的运用往往表现为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当遇到与历史上相同或相似的作战情况，把现实情况与历史战例进行类比推理，用历史经验代替对作战问题的客观分析；一种是把作战实际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根据对作战实际的研究，跳出习惯思维定式，制定并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不可否认，第一种思维方式能够让指挥员快速找到指导作战的办法，但却容易陷入经验主义束缚，从而死守经验教

条，最终导致作战失败，这样的战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指导我军作战实践中，毛泽东从来倡导的都是后一种思维方式。他除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作战经验之外，又不拘泥于这些经验，而是结合作战情况的发展变化，在思维方式上跳出常规，打破框框，实施新的作战指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指导志愿军从打大歼灭战到打小歼灭战的转变，就是他逆历史经验之向，摆脱习惯思维羁绊的经典之作。志愿军入朝初期，基于我军在解放战争后期积累了大量打大歼灭战的作战经验，毛泽东对志愿军实施了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指导，计划通过一两战役歼灭敌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在作战实践中，志愿军虽然曾经达成对敌人团以上建制部队的包围，但受地形、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制约，志愿军未能歼灭较大建制的敌军，即使在非常有利的第二次战役，也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敌军。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穿插迂回包围十余支团营规模的敌人，但绝大部分被“联合国军”在空军和坦克掩护下突围逃走。这种与解放战争后期大不相同的战况，引起了毛泽东高度关注。通过向前方指战员深入了解情况，毛泽东及时改变打大歼灭

战的思维观念，提出并确定了“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志愿军通过打小歼灭战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最终迫使敌人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逆不利战场之向，独辟用险胜敌蹊径

革命战争年代，敌人长期占据着战场主动权，他们通常会选择在交通、地形、天气等有利的条件下与我军作战，由此使我军经常面临险恶的战场环境。为改变这种态势，毛泽东指出：“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他所强调的“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实质上就是要求指挥员根据战争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通过运用逆向思维，在全局不利的战场环境中找到制造局部有利战场环境的方法途径，最终扭转被动局面，实现以弱胜强。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非常注重运用逆向思维，以此寻找有效扭转不利战场

的方法途径。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就是这一思维艺术的生动例子。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蒋介石制定南追北堵策略，调动10余万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从战场环境看，大渡河位于四川省中西部，沿途峡谷密布，水流湍急。红军缺少渡江工具，加之敌人前堵后追，战场环境十分凶险。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到此，面对这样的环境，一筹莫展，最终全军覆没。为了渡过大渡河，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安顺场，实施渡河计划。但由于船只太少，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将数万红军渡过河去。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 and 思考后，果断命令红军兵分两路，主力循江而上夺取泸定桥，最终确保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让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不朽篇章。

逆共识观点之向，力排众议因情施策

毛泽东运用逆向思维艺术指导我

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的深刻影响

□ 魏继才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作战指挥决策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再次掀起了应用热潮，将对战争属性、指挥方式、装备体系等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将对战争的暴力属性产生冲击。基于人工智能所催生的战争，将更多地体现在认知领域中，是利用信息、网络和通信等科学技术，通过人类的参与，在无人平台之间进行的对抗。参战人员将坐在舒适的房间内，通过敲击键盘或触摸屏来完成全部作战过程。战争的“无人化”，使得战争“流血的”政治属性遭到冲击，战争所体现出来的残酷

性、血腥场面将会减少，战争的暴力属性受到挑战。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将远远大于生理创伤。同时，人类将被自己所创造的客体所捕杀。因此，战争伦理将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战争的发动时机更加难以捉摸，战争的发动门槛将不存在明显界线。战争将不再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之一，作战人员生命毁灭数量将会大大减少，人工智能战争显得较为“人道”。战争将更多通过对对方无人作战平台或体系的有效摧毁，遏制对方的作战能力，迫使对方在精神和意志两个方面上屈服，从而达到战争目的。因无人智能实体的参与，战争将成为虚拟战争。

人工智能将形成新的战争指挥方式。指挥是军队各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的作战和其他行动进行组织领导的活动，包括对行动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传统指挥方式是依据战争目的，基于已有力量编成，依托指挥系统所进行的一种决策和实践活动。从指挥方式上讲，战争指挥与军事理论、力量编成、作战环境等息息相关，是对军事力量一种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运用。因此，对于传统战争指挥的理解，可更多地体现为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和合理使用。对于传统的战争指挥方式，在强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同时，也注重强调应立足于现有的指挥理论。基于人工智能所组成的战争装备体系，往往是在极端环境中，从极大和快速变化的信息中获取有效信息，然后遂行各种作战任务。人工智能无人系统所形成的战争装备体系，其指挥方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战争指挥主体地位方面，人类自身将处于监督或协同状态的指挥位置上，无人作战平台或装备体系，将以自身所具有的智能化，直接参与决策指挥。因此，基于人工智能的战争指挥，是人与智能武器的双重指挥，而且在局部作战过程中，智能决策系统将代替人来进行指挥。这种变化与指挥系统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速度等有关，人、智能实体（或群体）、行动实体之间，信息呈现出共享性，战场态势改变与作战行动之间融合为一体，使得战场感知与行动之间的环节大大减少，因而是一种和谐一体的指挥方式。在新型、安全的网络通信技术支持下，并行作战、协同生存、自适应区域侦察等将成为新的指挥作战方式。

人工智能将改变战争的装备体系构成。基于人工智能的无人作战平台和装备的使用，对支撑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武器装备及其体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无人作战装备的研制和使

用，美军最为积极。目前，美军已经可以对由100多架组成的无人机群进行有效控制和使用。在未来几年内，美军力图突破对由1000架所组成的无人机群进行控制和使用。从中可以看出，无人智能作战平台和装备的使用，已经开始改变武器装备体系的构成，也对武器装备体系在战争中的作用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工智能应用于武器装备，使得武器装备及其体系可在全时域、全空域、全频谱内投入使用。无人智能作战武器系统，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也克服了因人自身的生理因素所带来的武器装备使用方面的限制。无人作战武器装备及其体系，几乎可在任何恶劣甚至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中作战，基本不用考虑操控人员的生理状况。人工智能武器装备体系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不断重塑装备体系的构成，变革武器装备体系的功能结构和力量编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所形成的新的作战装备体系，其作战能力将由数量型向智能型+数量型转变。基于人工智能的装备体系，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将成为一体，并深入到人类的认知空间，使得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认知空间等融为一体，人类战争将是基于网络和大数据的信息化战争。

未来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将是基于信息控制下的无人智能体系之间的较量，也是主体参与其中的网络信息战争，这是智能时代的产物。面对这些影响，需要未雨绸缪，超前思考其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这就需要从战争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军事理论和信息技术保障等几个方面加以思考和应对。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战争力量将由数量型驱动转向智能科技型驱动，战争形态也就从自然中心战、机器中心战及网络中心战，逐步演进为智能化虚拟战争。人工智能将对战争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产生极大影响，思维和认知过程可用“O”“I”所形成的各种组合来描述，使得思维和认知从形式和内容上转化为计算。目前，人工智能仍然处于研究和发展过程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仅仅局限于一个较狭小的范畴，人工智能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但考验人类自身的知识结构，更考验着人类自身的思维范式。不管怎样理解，人工智能应用于战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王建安

□ 李海龙

王建安于1956年被授予上将，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战争年代的王建安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因为耿直无私，被誉为“铁面将军”。和平建设时期，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是为世人所尊崇和敬仰。他常说：“我们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等都要讲究实事求是，怎么干的就怎么说。”

务实究真莫放空炮，求同存异休要扯皮

王建安出身农村，对农业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破坏农业的行为深恶痛绝。1965年，王建安与济南军区的干部前往淄博孟家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他发现当地老百姓并不埋头侍弄庄稼，反而热衷于搞政治，导致生产荒废，这样的社教运动让王建安心生质疑。经过认真分析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果断指出应该尊重农业生产规律，摒弃这种“假大空”的教育形式，务实究真莫放空炮，求同存异休要扯皮。在王建的安的强烈争取下，几番斗争之后，孟家埕生产队逐渐转变了方向，农民的干劲越来越足，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还有一次，王建安到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农业生产典型的山西大寨参观。他甩开陪同人员，拒绝介绍，自己上坡下田与当地农民畅谈，发现当地情况与相关报道并不一致。考察结束后，王建安向中央呈上的报告中讲道：“大寨农民家中没有余粮，农田作业基本上是手工，实现‘四个现代化’首要问题是把粮食搞上去。”该报告被转发给中央政治局参阅。

搞自欺欺人的把戏，打仗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王建安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做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变成瞎指挥的官僚”。无论是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还是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去部队调研成为王建安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他还身体

力行地告诫身边的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

王建安最恨弄虚作假，凡事均躬身亲察。1978年4月，王建安听说某连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他方面工作也很突出，就想亲自去看一看。结果到部队后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训练方面，为了达到效果，战士们只训练自己优秀的科目，那些成绩不好的，只要上级来视察，干脆不准到训练场。再比如内务方面，为了检查时被褥整齐，不让战士们晒被子。甚至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凑够一定的养猪头数，向别的单位“借猪”。就是靠这种瞒天过海的办法，这个部队的工作这样“走在前”。而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将其列为典型。对此，王建安严厉批评，并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搞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平时可以以马渡过去，打仗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王建的安的调研扎扎实实，最讨厌那种众星捧月般的“走马观花式”调研。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来到福州军区某师进行调研，部队领导全员迎接。王建安予以制止，部队领导们面面相觑，但还是坚持陪同。王建安表示，下基层本来就是要倾听士兵们的心声，如果太多人跟着，没人敢提意见、说真话，调研不是走形式，不是安排几个能言巧语的士兵作汇报。见他们如此态度，王建安不免生气地说道：“你们要不去我就不去了。”此言一出，部队领导只好纷纷作罢。

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1978年底后，中纪委的工作开始陆续恢复。王建安作为中纪委常委，依旧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将每个细节都落到实处。尽管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文件和信访件，王建安仍然要求做到来信必复。曾在战场上驰骋杀敌的“铁面将军”，在纪委工作中依旧表现出老党员的初心和风范。老战友老部

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当战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能够跳出他人达成的共识观点去思考作战问题，最终力排众议，制定和实施更加符合作战实际的方针政策。如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余部在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步行动等问题。红一师师长余洒度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并一再强调这是符合中央主张的。与会很多人赞同和支持余洒度的观点。而毛泽东认为，秋收暴动已经受到严重挫折，为保存革命实力，必须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方案，把起义部队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经过耐心说服，毛泽东最终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作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战略决策，为我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再如，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赤水之后，蒋介石为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溪的狭窄地区，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方针。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决定将计就计，寻机歼敌。由于敌军担心埋伏，始终不敢轻易进攻，因而红军这一作战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而当时的战场形势是打鼓新场周围集聚着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和孙渡4个旅。红军如果强攻打鼓新场，必然会被敌重兵围困。生死攸关时刻，毛泽东陈述利害，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当时未能说服与会人员。会后毛泽东连夜提着马灯找周恩来商量，最终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计划，实施第三次渡赤水，于运动中给予敌人重大打击。这一逆向思维的实施，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被敌围歼的险境。红军三渡赤水之后，又于3月下旬四渡赤水，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